

古典音樂

東西走廊

這裡講的「古典音樂」(classical music)或譯「典雅音樂」、「嚴肅音樂」，泛指用樂器演奏的名曲，包括交響樂、協奏曲、室內樂或其他名曲，不包括風行一時的「流行歌曲」。中國也有古典音樂，但作品少，沒有廣泛流傳。我指的是西方傳來的古典音樂。對於這個詞的定義，這裡就不深究了。

我曾在短文中提及，聽過去流行的歌曲，容易引起人們對當初聽到時的情景的回憶。聽古典音樂某個樂曲引起的快感，我覺得跟最初聽到時的情境沒有關係，似乎都可以使人們得到同樣的美的享受。我對音樂所知極少，不會擺弄任何樂器，連口琴都不會吹。現在喜歡上一些「大家」的作品。得益於電台的推廣和點撥。

楊繼良

在沒有經過點撥之前，驟然聽到這樣的樂曲，會覺得幾十件樂器齊奏，相當吵鬧，「不知所云」，甚至令人厭煩。解放前夕，上海的法國文化電台和蘇聯電台，都有專門介紹名曲的節目。他們接受聽眾用信函或電話點播，主持人和聽眾還有互動、對話。在播送一個名曲前，除了對作曲家的生平故事作介紹之外，主要是解釋該曲各個樂章的主題和意境，會多次播送主旋律，增加聽眾的印象。例如代表「命運」在敲門的四個音符；田園交響曲各樂章所描繪的鄉村情境；悲愴交響曲與作曲者本人遭遇是如何從旋律中表達出來的。實在太令人低回嘆息。我和弟弟那時都只十四、五歲，被主持人的介紹引進角色，在再次播送全曲時，不禁手舞足蹈、模仿樂隊指揮。我們都從此喜愛上了這些名曲。我和老伴結識不久，為她放送門德爾松著名的小提琴協奏曲和貝多芬的帝王鋼琴協奏曲，她立刻被溶入到旋律之中。在她原先的生活環境中，不可能接觸到這樣的音樂，上帝創造的世界，就會缺了這絕美的一塊！一些被廣泛接受的「名曲」，我認為肯定會永遠流傳下去。

當然，解放前上海電台的節目，其他城市是聽不到的，那時只有教會學校在傳播古典音樂。解放初，有的大學有古典音樂史或音樂欣賞課，在北京也能收聽到一些古典音樂介紹了。「文革」開始，被禁絕了二十年。美國費城交響樂團陪同尼克松訪華，一九七三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演出時，據當時二十八歲的小提琴手赫羅爾德·克萊恩回憶，演奏會結束時，中國聽眾禮貌地鼓掌。「他們像剛聽到一些完全陌生的東西。」美國音樂家們在回旅館的途中，飛馳而來的軍車攔住了他們乘坐的巴士。「我記得有個傢伙嚇壞了。」打擊樂手安東尼·奧蘭多回憶說。其實，軍車攔住他們的原因是，毛澤東的夫人想得到一張音樂家們的照片，並為他們獻上一束鮮花。由此可見，即使關起門來可以橫掃一切四舊，迫使好幾位著名的中國音樂家自殺的自殺、逃亡的逃亡，但終究不能不承認古典音樂是人類文明的巔峰之一；從場上觀眾的回應也可以看到，這些樂曲的旋律雖然極其明顯、美妙，但欣賞能力還是需要經過培養才能獲得的，不然只能是「完全陌生的東西」。（據《百度》，這一段報道見於五月八日紐約時報。）

「文革」後中央樂團指揮李德倫，到各大學介紹古典音樂，北京電台也定期有介紹。廿一世紀以來這方面的普及比過去更多了，最近北京四中，居然學生可以排演一場古典歌劇，過去是辦不到的。美國的大學都會有「音樂欣賞」一門選修課，三個學分。老伴在我們當地的州立大學聽過這門課，說就是介紹一些名曲，我們在家中常聽的那些。一個學期十五節課，可以介紹十五個名曲，就是受了基本的訓練，受用終生了。中國的大學沒有普遍設置這門課，受高等教育而沒有這方面的啟蒙知識，我覺得很不足。我在香港任教時，那個學校似乎沒有音樂欣賞課，不知其他大學有沒有。我有一些香港學生熱於閱讀以「娛樂圈」八卦新聞為內容的報紙，這和他們的教育程度很不相稱。

國內一般城市的電台也許沒有古典音樂的介紹。我的妹妹是南京藝術學院的鋼琴退休教授，她說她聽到的電台不放送古典音樂，更沒有解說的歌目，以至於大學生讀到畢業，也不知道西方古典音樂為何物。欣賞古典音樂應該是受高等教育者應有的修養之一，在全國範圍內有待普及。

勇於害怕

韋良秀

回到闊別已久的家鄉，和幾位多年不見的摯友約了一個飯局。菜是次要，按照老規矩，不醉不歸。大高是朋友當中年齡最大的一個，我先為他斟酒。我剛把酒瓶拿起來，大高將杯子一捂：「不喝了，不喝了。」我詫異萬分，放在以前，這可是個不喝盡興不離席的人啊。正在纳闷，大高一臉嚴肅地說：「戒了好幾年了，血糖偏高，睡眠也不好……」望着眼前這個身材略微發福的漢子，我腦海中忽然浮現出當年他叱咤酒場的身影。遙想當初，這可是個「酒精考驗」的硬漢，就算喝吐血，也絕不會服輸。幾年過去了，沒想到「軟」了這麼多。也罷，我繼續倒酒。結果，一圈下來，一瓶酒只倒出去三分之一。雖然大家推辭的理由不甚相同，但都表達着同一個意思：不敢喝了，知道害怕了。

害怕？害怕什麼？老楊對我說：「除了你之外，哥幾個相繼成家立業，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了，再不是那時候的毛頭小子，天不怕地不怕。咱們在座的每個人，都支撐着一個甚至好幾個家庭，真的不能有任何閃失……」「只要感情有，喝什麼都是酒！」小李端起茶杯，伸向桌子中間。我們這些曾經懵懂的少年紛紛起身，一飲而盡。

認識一位老司機。那天坐他的車去辦事，聊起駕駛技術。他說，自己以前開車，能衝就衝，能擠就擠，如果有車超過自己，總得想辦法反超過去，不然心裡一天都不舒服。現在知道害怕了，過十字路口時，明明是綠燈，也要帶一腳剎車；在高速公路上，限速一百二十的車道，自己最多開到一百一十……

實際上，隨着年齡的變化，我自己也越來越害怕。上學的時候，為了省勁，右手扶車把，左手抓拖拉機的尾部，為了秀一下自己的技術，還會將右手懸空，招呼後面的同伴。現在害怕了，規規矩矩地走人行道，看紅綠燈，再不敢走S線；戀愛的時候，脾氣一上來，動不動就「河東獅吼」，哪管對方什麼感受。現在害怕了，能不衝突就不衝突，能心平氣和就心平氣和，終於明白維繫感情的重要了；剛參加工作的時候，棱角分明，老子天下第一，誰也別想用你的脾氣挑戰我的性格，結果弄得自己孤立無援，人人得而避之。現在害怕了，知道了圓融，包容，通融，懂得了凡事不可能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善待同事的同時，也是善待自己……

害怕，指向的並不一定是膽怯。有時候，那是一種勇氣，一種自律，一種象徵着成熟的擔當。

書啊，書！

燈下集

楊光治

如此賤賣書籍，自然是迫不得已，原因何在？上網找到了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國圖書報》刊載的《不買書的十八個理由》一文。原來，這一景況在那時已被察覺。該文提出的理由是：對作者反感、推薦者不靠譜、讀者評論影響、書名不知所云、封面設計太差、腰封太惡俗、使用假腰封、簡介沒做好、目錄有問題、文本質量不高、翻譯太差、拒絕「編著」、數字閱讀衝擊、出版方的品牌、買書不方便、圖書定價偏高、讀者經濟緊張等等，然而都沒說到點子上。筆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受社會大環境影響。這問題如何解決？如此下去，人才怎能成長？國家的前途將何以堪？我這個退休老傢伙只能嘆息一句：書啊，書！

被譏為「稀有動物」，對此，我一笑置之。不久前看到某大報的報道說，二〇一四年廣東人購書量居全國首位，佔全國的六分之一，因而還有點興奮起來。可是前幾天到佛山市某新建的文化區遊覽，一個書檔的景象卻令我黯然神傷：《電工手冊》、《孕婦生活指南》之類「實用」書籍和《中國通史》、《紅樓夢》、《人間問訊》、《元曲三百首》等重要文學著作，雖然都是裝幀精美的新書，但都按重量賤賣，每斤只賣人民幣十三元，令人懷疑自己的眼睛！想不到，位處於珠三角中心地域、文化事業比較發達的佛山，書籍竟淪落到如此可憐的地步！可以想像，在那些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地區，情況定然更加不妙。陪遊的朋友說：「賣得實在便宜，就算是盜版貨也虧本，但如果被當作廢紙來賣，每斤才三角錢呢！」我沉默了。

「以賺錢為綱、以娛樂為緯」之說不斷侵蝕人們的靈魂，令讀書無用論重新抬頭。這一問題引起了領導部門的密切關注，為此採取了不少措施。就說「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從二〇〇三年起，每年都舉辦全國書香節。此舉獲得中宣部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讚許而評為「全國全民閱讀活動優秀項目」，被譽為「文化的盛宴一秀」。著名小說家莫言還為此發出「廣東的書香很濃」的讚嘆；但實際上讀書風氣仍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淡薄。然而年逾古稀的我不改舊習，每天依然開卷，偶爾還忍不住敲擊鍵盤將心中感受抒發一二，因此

時光之輪轉入新世紀後，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以賺錢為綱、以娛樂為緯」之說不斷侵蝕人們的靈魂，令讀書無用論重新抬頭。這一問題引起了領導部門的密切關注，為此採取了不少措施。就說「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從二〇〇三年起，每年都舉辦全國書香節。此舉獲得中宣部和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讚許而評為「全國全民閱讀活動優秀項目」，被譽為「文化的盛宴一秀」。著名小說家莫言還為此發出「廣東的書香很濃」的讚嘆；但實際上讀書風氣仍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淡薄。然而年逾古稀的我不改舊習，每天依然開卷，偶爾還忍不住敲擊鍵盤將心中感受抒發一二，因此

詩，表明讀書已成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品。生活裡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陽光；智慧裡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英國大戲劇家莎士比亞這段話，強調了書籍不可取代的地位。……這些名言之言，已被很多人奉為修身的主臬；所提及的書，自然是指有益之書。我在家長指引下，從小就喜歡與書為伴，就算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嚴酷歲月，也想法尋找、秘密閱讀。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的號角喚起了全民讀書的熱潮，我在這個黃金時段，有幸調到一家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業餘還抓住點滴時間撰寫書評、散文、隨筆之類的文字，並先後還編成二十多本集子出版，雖然辛苦但很快樂。儘管我這些東西遠遠算不上是莎士比亞喻說的「陽光」和「翅膀」，然而也無害於世。

我們——落座後，省長進一步解釋說，「得知總領事長途驅車而來，我再次也要見面。秘書曾向我建議是否更改一下約見時間。我想，還是不打亂總領事的日程為好。」接着他鄭重地說，「今天我在主持本省非國大的重要會議，商討人事等方面的事情，沒想到會議一拖再拖，實在脫不開身，真是太對不起老朋友了！」他不假任何託辭，全盤托出，如此磊落坦誠，反而讓我感到過意不去。我接着說，「省長閣下那麼忙，我還要打擾，你完全有理由可改期見面。實際上你把推遲的約見提前實現了，幫了我的忙。我對此表示衷心感謝。」然後，我把約見他的內容闡述一遍。他邊聽邊認真地記下。當我提及前段時間浙江省發來的邀請信是否收到？他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下，抱歉地說，「對不起，實在對不起，由於事情多，我把這事忘了，信還擱在抽屜裡，多虧你提醒呀！」說罷，即把信從抽屜裡找出來，並仔細地閱讀。他如此懇切地當着客人的面承認自己的疏漏，沒有半點掩飾，令我十分感動，非洲朋友多麼樸實無華。省長沉思了一會，認真地說，「感謝中方對我的盛情邀請和信任，我願代表非洲地區在會上發言，將盡力安排好省裡的事情，屆時赴華。我還要感謝中方周到的安排，邀請我夫人同行。」談話中，他熱情讚揚我國科教興國戰略，希望赴浙江省多了解一些文化教育發展的情況。我說，浙江省不僅是我國的經濟強省，還是文化教育大省，出了許多科學家和文化名人。預祝省長閣下前去訪問取得圓滿成功。斯托菲爾省長專注地聽着，眼睛裡放出喜悅和興奮之光。臨別時，我向他贈送了我國的茅台酒和長城葡萄酒，並說明，按照中方禮儀，省長赴華前，我館要為代表團踐行，考慮到雙方相距太遠，我們不便前來送行，留下中國名酒，請代表團屆時品嚐。他感謝中方的熱情和盛意，高興地收下了贈酒，並再次表示歉意，「今天讓總領事一行回東倫敦太晚了。」我情不自禁地伸出雙臂向他擁抱作別。

非洲兄弟越黑越光亮

陸苗耕



與時並進的非洲青年

（資料圖片）

，對方表示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一點半，省長在辦公室會見總領事，我聽了很高興。

二十四日一清早，我偕夫人陳婉梅，並率兩名同事，長途驅車前往東開普省，黃昏時駛抵距省府六十公里東南方向的東倫敦市，下榻假日旅館。翌日上午，再次與對方敲定我約見時間，對方說沒有變化。二十五日下午一時，我們比預定的時間提前三十分鐘進入省府大院，工作人員把我們引領到接待室等候。一個小時後，還沒有任何約見消息。又等了一個小時，接待室還是異常寂靜，冷板櫈已坐了兩小時。過了一會兒，工作人員帶我們上了一層樓，終於來到了省長辦公室的門前，那裡有幾把椅子，請我們坐下。我心中竊喜，這下可好了，終於盼到頂門坐等，估計幾分鐘就可以見面了。誰知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逝去，快一個小時過去了，還是悄然無聲，真讓人迷惘、失望。我心裡十分窩火，昨天千里迢迢風塵僕僕趕來，今日又早早抵達省府大院，沒想到全耗在一個「等」字上了。特別是晚上我還有與東倫敦華人社約定的一場活動，但事至如此，還有什麼辦法呢？

我終於打破長時間的沉悶，向對方的工作人員說，「省長閣下是否在外地出差，不知何時回來？」對方說，他在本樓開會，沒有說取消約見，只是希望你們再等候。我不便再追問了，心想已經坐等了三個多小時，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見面。這在外交禮儀上是少有的，今天終於讓我嘗到了「三顧茅廬」的苦澀滋味了。考慮到省長以往對我們一直十分友好，多次千里迢迢來開普敦參加我館的重要活動，我壓着心中的不悅，硬着頭皮等下去。大約四點三十分時，走廊另一端樓梯口處終於響起一陣急匆匆的腳步聲。我的眼睛豁然一亮，彷彿在茫茫大海

域外漫筆

當年，毛澤東有句名言，是非洲兄弟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他還向一位非洲國家領導人說，非洲兄弟越黑越光亮。我的外交生涯曾長期常駐非洲工作，同非洲朋友的密切交往中，切身體會到非洲兄弟，別看膚色是黑的，卻閃耀着許多優秀品質。他們特別樸實、憨厚、真誠，沒有任何矯飾做作和半點虛假，「真是越黑越光亮」。

二〇〇〇年我正在南非開普敦擔任總領事，七月中旬接到國內有關部門下達的一項緊急任務，通告九月下旬中國人民友好協會將在北京舉行國際友城會議，各大洲均有代表出席，要求我總領館盡快與東開普省省長斯托菲爾聯繫，邀請他率團與會，並作為非洲地區代表在閉幕式上發言。還告，邀請函已於今年四月由浙江省外事辦辦公發出，希望斯托菲爾省長出席北京國際友城會議後即赴浙江省訪問，正式簽署兩省締結友好合作協議，但國內尚未收到東開普省的答覆。要求我館盡快了解情況，並做好促問工作。

我接到通知後十分高興，這是我領區開館以來首次邀請省長級高官往訪，勢必會有力推動該省與我國有關省的友好合作。我館表示一定努力設法完成此項緊迫任務。東開普省省府比紹離總領館所在地開普敦市一千二百公里之遙，按慣例，總領館可以打個電話去催問一下，或總領事出面致函重申一下。但我認為這樣做，工作力度不夠，溝通不深，有可能此事等於抓而不緊而「黃」了。我想，還是以「三顧茅廬」的請賓辦法，採取當面邀請，可能收到良好效果。於是我不顧手頭其他工作的繁忙，也不管路途之遙，決心長途驅車當面說項。經聯繫

項松茂怒斥日酋為國殉職。早年去上海任中英藥房會計，後被黃楚九聘為五洲大藥房經理。一九二〇年研製固本肥皂，將五洲藥房改為五洲固本肥皂廠，因質量高於英產祥茂肥皂，成為國產馳名產品，遠銷國內外。一九三一年起，歷任上海租界華人總領館理事、華商自業公會主席、中國紅十字會特別委員等。

隨着國民黨軍隊在內戰中節節敗退，金融市場全面崩潰，陳光甫感到財政收不抵支，金庫告罄，遂陸續將上海銀行的資金向香港和曼谷分行轉移。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海解放前夕，陳光甫去香港，後定居台灣，於一九七六年去世。

為抗戰爭取美援的陳光甫

秦亢宗

抗日門志

金潤庠（一八九〇——一九六二），浙江鎮海人。一九三一年與竺梅先合資創辦民貨、華豐兩造紙廠。一九三五年，為抵制洋貨，生產捲煙紙成功，金潤庠出任兩廠協理。

金潤庠送謝晉元國旗鼓舞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戰爭爆發，日軍大舉進攻上海，陳光甫與同仁在九月二十九日申報《登刊〈告全國同胞書〉》，要求政府向日宣戰。時任任上海商會理事，兼「上海抗敵後援會」軍需部副主任。他協助救海先籌實救辦國際紅十字會傷兵醫院，救治幾千名前線將士，並組織上海市民捐募大量物資送往張治中浦東前線司令部。

金潤庠送謝晉元國旗鼓舞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戰爭爆發，日軍大舉進攻上海，陳光甫與同仁在九月二十九日申報《登刊〈告全國同胞書〉》，要求政府向日宣戰。時任任上海商會理事，兼「上海抗敵後援會」軍需部副主任。他協助救海先籌實救辦國際紅十字會傷兵醫院，救治幾千名前線將士，並組織上海市民捐募大量物資送往張治中浦東前線司令部。

往事鉤沉

陳光甫（一八八一——一九六二），江蘇鎮江人。一九〇七年畢業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回國後出任江蘇省銀行總經理。一九一五年六月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自任總經理。一九二七年任江蘇省暨上海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同年創辦中國旅行社，發《旅行雜誌》。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央銀行在上海成立，任理事。一九二九年出任國庫聯盟勞工局代表。一九三〇年回國後上海銀行增資五百萬元，陳光甫成為上海著名銀行家。次年國庫聯盟中國分會在上海成立，陳光甫被推為會長。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金融市場處於一度混亂之中。在危難時刻，陳光甫以民族大義激勵上海銀行員工們「在今抗戰局面下，最重要的是應具有抗戰之精神」。一九三八年年初，任國民政府軍需貿易調整委員會主任，國民參政會議員。九月，代表財政部赴美洽談戰事經濟援助。陳光甫抵紐約後，又與美國財政部長摩根見面。

經過一番協商，決定以桐油作為借款的擔保，在中國成立復興與公司，在美國組織世界貿易公司，以中國銀行在紐約的經理處為擔保，因此便成為商業機構與銀行之間的商業借款。一九三九年二月赴美簽訂了二千五百萬美元的桐油借款合同。電報傳到中國政府，蔣介石和財政部長孔祥熙立即返電對陳光甫給予褒獎。正當陳光甫準備返回上海時，突然接到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的電令，囑他繼續向美國接洽一筆數額較大的財政借款。陳光甫以抗日救國為重，後又向美方簽訂了二千萬美元的填補借款。消息傳到國內，我國政界商界對陳光甫為抗戰所作的貢獻讚譽有加，在新聞媒體上稱他為傑出的愛國金融家。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也十分讚賞陳光甫的才幹，於一九四一年派私人代表向蔣介石當面推薦陳光甫，稱讚他是「中國最優秀的金融家」。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隨着國民黨軍隊在內戰中節節敗退，金融市場全面崩潰，陳光甫感到財政收不抵支，金庫告罄，遂陸續將上海銀行的資金向香港和曼谷分行轉移。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海解放前夕，陳光甫去香港，後定居台灣，於一九七六年去世。

項松茂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中勉勵五洲製藥廠職工參加組織生產軍用品，支援前方將士。他在廠內編組抗日義勇軍一個營，自任營長，每日進行軍事訓練，並發動職工捐獻一日工資以援助東北抗日義勇軍。項的這些愛國行動早已引起日軍注意，心存忌恨。一月二十九日傍晚，五洲藥房二支店突遭日軍槍擊襲擊。次日，一群日軍在店內搜出數套義勇軍軍制服後將邦毓等十一名職工押上卡車馳去。項松茂得知這一消息，不顧個人勳阻親自前往江灣日本海軍司令部探聽情況。次日，項松茂被日軍所捕。面對敵人審訊，從容鎮定，毫不畏懼，並斥問敵酋：「要殺便殺，中國人不愛中國愛什麼？究竟哪佔領我們的土地，屠殺我們的人民？你們隊個激起中國老百姓排斥日貨呢？」民衆啊，

項松茂遇難後，國民政府褒揚他「抗戰不屈，死事甚烈」，蔣介石題贈「精神不死」。

項松茂遇難後，國民政府褒揚他「抗戰不屈，死事甚烈」，蔣介石題贈「精神不死」。